

# 山西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24

5

# 山西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(內部發行)

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二年·太原

**山西文史資料**

**第二輯**

**山西文史資料編輯委員會編**

**(內部發行)**

**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**

**山西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晉出字第二号**

**山西省新华书店發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**

**太原印刷厂印刷**

**开本: 850 × 1168毫米 1/32 · 4  $\frac{3}{8}$  印張 · 90,000字**

**一九六二年二月第一版**

**一九六二年二月太原第一次印刷**

**印数: 1 — 5,900册**

**統一书号: 7088·250**

**定 价: 四角六分**

## 目 录

### 义和团运动在汾阳太谷和阳城

- ..... 田静轩、吴华亭、王廷杰(1)
- 帝国主义办理山西“教案”的讹诈罪行 ..... 乔志强(10)
- 毓贤之死(摘自“拳祸”惨史).....(18)
- 帝国主义扼杀山西义和团的罪证 ..... 張茂先 译(21)
- 天主教在山西之創始及其发展..... 郭繼汾(34)
- 山西大学堂和爭矿运动 ..... 冀貢泉(38)
- 河东革命記(待續) ..... 赵肇寰藏稿(46)
- 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 ..... 南桂馨(84)
- 訪問参加太原起义的三位老人 ..... 田 櫟(113)
- 定襄辛亥革命活动 ..... 齐宝璽、李召軒(118)
- 辛亥革命李生裕上党劝降經過 ..... 李文彬(123)
- 金永控制山西时的政治情况 ..... 李凤翔、俞家驥(126)

## 义和团运动在汾阳太谷和阳城

### ◇汾阳义和团的斗争◇

田静轩 口述

1900年——光緒二十六年庚子，以“反清灭洋”为口号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，就山西說，汾阳县是重点县之一。我們在9月7日走訪了了解当时情况的田静軒老先生，他現在是汾阳城的一位医生，化費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和我們促膝而談，历久不倦。他說：

庚子年，义和团在汾阳活动得很激烈，很普遍。除城內由于县知事沈士林的严厉镇压，活动的人較少外，而乡村中青年小伙子們中，信仰义和团者甚多，念咒、打拳风行一时。

清家在汾阳的統治者有两派，一派信义和团，一派不信。比如知府徐繼儒就十分相信，主張放手；县知事沈士林不贊成，出布告禁止，要各家父兄严加管束，抓住開义和团的人就用枷枷起，严加拷打。

汾阳城內有一个耶穌教会，另外設立了一个医院。乡村里的教堂，山区比平川多一些。信教的人，也是这样。汾阳教会当时的負責人是艾牧师，美国人。

这一年，义和团杀洋人，汾阳可說是一网打尽。先說一說杀

洋人以前的一个故事：

离城十里有个朱城村，是一个红灯照（男的叫义和团，女的叫红灯照）闹得激烈的地方。一些女孩子們一手掌灯，一手持扇，闹起来可以在房上行走如飞。有一天，一个“二毛子”（中国傳教士）路过朱城，給红灯照发现，当即打死。村里报了官，沈士林帶領他的三班衙役到現場驗尸。沈一进村，一个姑娘（红灯照）就跟在他的轎子后面，大罵“狗官”，一直罵到停尸的地方，还不停息。沈士林的轎子停落，她又跑到轎口罵，沈十分恼火，一下轎就用脚一踢，沒有踢住红灯照，反而連靴帶袜踢飞了丈把远。衙役們急忙把靴袜拾回，沈士林只得狼狽地坐到轎里穿靴穿袜。

鬧了這場笑話，沈怒气更大了，喝令衙役把红灯照捆縛回衙。回衙后，用藤鞭在这个女孩子身上抽打了二三百下，打得这个女孩子渾身都是伤痕。

之后不久，发生了义和团在南开社杀死外国人十二名的事件。

省里（指太原）巡撫毓賢是一个最信义和团，对外国傳教士有仇恨的人，他写了一封信給汾州府知府徐繼儒，要他把外国人杀掉。徐知府把这封信給知事沈士林看了，沈一言不发，起身就出了知府衙門。回到县衙，見了一些紳士，大发雷霆說：

“要我办，要撫台給我来公文！”

一般紳士听了，都摸不着头脑，目瞪口呆了一会，有人才发問了。沈士林原原本本說了一遍。

紳士中有个叫呂振山的，汾阳蕭家庄人，主办乡团，任乡团长。听了这些話，就躍了出来，直奔知府衙門。他向知府自报奋

勇。徐知府大为嘉許，就在办公桌上写了几句話給呂看，徐問：“看清了嗎？”呂答：“看清了。”“就这么办！”呂振山就奉命出来了。

呂振山到了教会，找到艾牧师說：外边风声很紧，你們打算怎么办？在汾的洋人早已成惊弓之鳥，听了呂的話更加惊恐，馬上向呂求計。呂答应保护他們出境，先到平遙，再轉天津。呂走后，洋人是不很放心的，有的很怀疑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別无良法。

第二天，呂振山雇了十二輛大車，赶到教会門口。临行，艾牧师对呂說：“办事要凭良心！”呂答：“有上帝在！”

車走到武家巷，車上的一个外国姑娘趁人不备，跳下車逃到李振阳（医生）住的外院地窖里，被李看見，本想搭救，又怕出什么事，和房东商量，房东說：“这是要滿門犯剽的呀！”李怕了，把这姑娘拉出，推在院門外。她只好又追上了大車。

原来計劃，走在汾（阳）、平（遙）两县交界的地方才动手的，在两不管的地方，两县都沒有責任。赶走到南开社，义和团就从两边的高粱地里奔了出来。

艾牧师車上坐着一个“二毛子”費其鶴，河北人。是一个死心踏地的洋奴，当事到紧急的时候，仍要和洋人共生死。艾說，赶快逃命去吧！把他一脚从車上蹬了下来。这时，洋人惊慌乱叫：“救命呀，呂伯伯！……”在乱喊惨叫声中，十二个洋鬼子都被杀死了。

事情发生之后，县知事开堂审問了这个案子。因为杀洋人的义和团散了，沒有当事人；呂振山是护送的，也沒有受到处分。同时，有了审問档案，也免掉了洋人的指控。

再談談外國人和“二毛子”在汾陽的反扑。前面提到“二毛子”費其鶴逃命走了，他先逃回城內魏巷街找教徒張應祺和姓韓、姓高的，沒有找到。第二天又逃到補城西找到教徒任庭芳，由任給他換了服裝，帶上銀兩逃往天津。任隨後也逃到天津，又轉到北京找到費其鶴。他們都住在北京趙公館（原為王府），身上帶的是八國聯軍護照，橫行無阻。

住了月餘，英國牧師叫任庭芳回山西送信，一送汾陽，一送太谷教會。信的內容是調查教案。太谷接信的是“二毛子”李拐子。

汾陽辦教案時，來的是文大夫（不知那一國人），住在考院裏，盛氣凌人。教徒們在洋鬼子支撐下又囂張起來，每天到考院裏去的教徒，絡繹不絕。去的教徒，大吃大喝，三個人就吃一桌飯，早飯是四盤菜、麵條，午飯是八盤八碗。花了汾陽人民的許多錢。對人命的賠償更不用說，外國人的命錢更沒有底兒了。

從此，外國人在汾陽趾高氣揚，入教的人更多了；把二十多個小學校門口挂上了教會的牌子，陰謀作文化侵略。知事看到這種情形，寫信質問教會。這時，文大夫走了，來的是一个裴牧師，裴牧師無辭答復才把教會的牌子摘去。

後來縣知事對教會沒有一個敢問敢問的。城裏的警察除保護縣衙門而外，還給教會站崗保護。



## ◇太谷义和团簡况◇

吴 华 亭

义和团为清时秘密会党，光緒二十六年起事于天津，隨即蔓延直隶、山东、山西各省，毀教堂、杀洋人、轰轰烈烈，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坚强意志。

当时太谷的情况和全国一样。以傳教为名的美帝国主义者，在太谷城内南街路西賃了武昆的一所院子，請刘凤池(榆次人)为講師，宣傳美国的“文明”。星期日和星期六，为他們傳教念經的主要节日，因为在唱歌时用风琴伴奏，吸引了不少好奇的人們。(当时除教堂外，太谷其他地方都沒有风琴)每天太阳落山时，城关教徒和一部份市民、商人、小孩，都到教堂听講，我也曾去听过几次。主講人刘凤池，一派奴才相，說什么美国非常文明，到处設立学堂，保送子女入学，生活国家供应，設立医院，捨药，治病救人。又說什么中国人口多，什么也腐敗，不好。因为他們尽辱罵我們，所以引起人們的不滿，人人切齿痛恨鬼子。当时有太谷水秀村大师兄二师兄(拳术家)，和榆次石鉄村的大师兄，鬧起义和团，和省外义和团联络，招收弟子，提出“扶清灭洋”的口号，在很短時間內，即組織起一千余人，傳习拳棒。到光緒二十六年夏天(時間記不清了)聚集太谷新教堂門前，个个朝南立，口念“三請圣母，唐僧、沙僧、八戒、悟空”；往倒一跌，再站起来即拿刀子寻杀洋人，攻打南街新教堂。洋人將門封閉，向外开枪，当时

打死义和团二人。因攻門不开，从新教堂对門“四順席店”內扛出草席放火，攻打冲杀，開門打入南寺(即現在的太谷师范內)，捉出洋人八名，當場杀掉。傳教士刘凤池，被义和团开膛，摘出心来，說其心已黑，真成了洋鬼子的走狗了。

太谷义和团的活动把洋人的气焰大大压服，但腐敗无能的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屈膝，賠款求和。太谷乡紳代表，太谷县知事，穿滿身重孝，送葬洋人。因被杀的洋人中，一名姓貝，一名姓露，后在太谷南門外用中国人的庚子賠款修起貝露学校，又在东門外修起銘賢学校。对中国人民繼續进行文化侵略。

上述就是太谷义和团的簡况。

注：本文作者系一位87岁的老人。

## ◇阳城东石白村义和团起义始末◇

阳城文史研究館 王廷杰

阳城义和团运动鬧的最厉害的是东石白村，此外，鄆山村，孔寨，梁城村等地，也有一些活动。

东石白村距县城二十五里，約三百余戶。忽于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間，以吳張喜为首，組織十余人設坛念咒，每日數次，旬日之間，一律披神上馬。吳張喜自称为包文正，其余諸人，神号不等。他們先是破陣，声言天主教將紙人紙馬，分布各院，若不及早消灭，群众將有非常的灾难，所以村中父老子弟，阻撓者少，拥护者多。

該村吳水旺，四十余岁，家道小康，生活悖謬，对于义和团的

举动，很不满意，乃前往距石臼十余里之铁罐沟天主教徒高逃命家报告义和团的行动。高逃命给吴水旺写了一道黄符，吴水旺立即回到村里，来到大庙。适值当时义和团破阵未回，吴水旺把符放在香炉底下，翻身就走。及至义和团归来，发现此事，即刻开会，研究办法。正商议间，团丁报道，吴水旺身坐屋脊，左手提红灯，右手执厨刀，刃砍屋脊，口中念念有词。义和团团长勃然大怒，一面差人报玉皇谷（南窑谷垞王催古，号称玉皇），前来破敌，一面带领团众，到南院（吴水旺住院）集合。这时吴水旺仍很猖狂，毫不示弱。团长下令，登楼拿贼，一人跃上屋顶，用杈将吴水旺挑落墙外，当即跌死。随即又把尸体拖到圪节泓，先剐后烧。

吴水旺有个儿子，名叫三海，不識时务，竟口出大言，为父报仇。团长听得这话，怒发冲冠，即刻派人将三海绳索索绑，拿来定罪。但见进庙全身无破绽，出门两块血淋漓。随即拖到圪节泓，付之一炬，与其父一路而去。

这天城里的官差，正在石臼催粮，亲眼看见这件事情，吓的魂不附体，粮也不敢催了，饭也不敢吃了，抱头缩项，回到县城，向知县叶廷楨一五一十从头至尾把这事哭诉了一遍。叶廷楨闻言大怒，并且低估了义和团的力量，以为愚民作乱，有头无尾，一人正法，众人星散。遂委任四衙官郑道湜，城守营长宋富贵，带领官兵三十人，捕役十五人，于八月初七日，耀武扬威，杀奔东石臼村去了。

却说义和团自从烧杀了吴水旺父子以后，自觉难保无事，每天放哨。团丁马三腰这天探得县兵出发，即时回团报信。团长得了消息，即刻鸣金聚众，出村破敌。走到寨岭，双方相距不远。

县兵看见义和团团长头戴英雄黑帽，手拿春秋大刀，威风凛凛，真象一个活武松，顿时吓得东倒西歪。只见义和团喊一声杀，个个冲锋陷阵，十分勇猛。宋富贵见势不好，滚下马来，落荒而逃，只余郑道滢和随身护兵，身体肥胖，难进难退，仍想仗四衙的身份，喝退团众，勉强上前，叫声对阵听话。言方出口，棒已临头，血流满面，墜于马下。团长及时下令，败兵莫追，计点俘虏，除马下半死不活的四衙老谷外，尚活捉营兵二人、捕役二人。时郑道滢昏迷不醒，只好用扁担抬回村里。其余四人，绳捆索绑，推的推，牵的牵，齐集圪节泓，先剐后烧。

当天晚上，宋富贵败回城去，见了知县叶廷楨，大放悲声，哭诉其事，吓得叶知县目瞪口呆，说不出话。停了一会，才吩咐衙役，先封城门，再议后事。连夜申文府尊，声称十九村人造反（石臼写作十九，故意扩大其事），杀死捕庭郑道滢和兵役多人，请早日发兵镇压，以免燎原。府尊不明真相，速委楊总爷（不知其名），带兵来阳，见势而行。

楊某奉命，连夜起身。到县住了一日，次日乘夜出发，要給义和团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打击。

可惜义和团在杀退县兵之后，有些麻痹大意，不知思患预防。及至楊某兵临村外，枪声震耳，方才鸣金聚众，已经缓不济急。因而，胆小者闻风而逃，耿厚者独力难支。时有团丁崔学考（神号二郎），闻金到庙，踊跃登屋，立足未定，而庙后府兵的抬枪子弹，打中眼眶，当时墜身庙后。府兵恐有埋伏，不敢骤然进庙。探听既久，方知空庙无备，于是带领队伍，一拥而入。但见所有团众奔跑一空，庙中所留，只有一个小和尚，几个白发老翁而已。这一战事，庙内杀死小和尚兴隆一人，村中杀死張小愿一人（九

女星)，誤拿酒來山、吳小全二人(來山非義和團，小全系鐵匠)，又誤拿老王、有呆父子二人，跌傷崔學考一人。

石臼戰事既畢，楊某又向南窰圪坨進攻，兵行至白腰路上，忽見王崔古(玉皇谷)，威風抖擻，勇氣昂揚，騎驢執杈，迎面而來，看見府兵，撿杈便刺，奈寡不敵眾，被府兵一刀將他的左足砍了半截，疼痛難忍，墜于驢下。當下被捉。因為不能行動，乃用框子一個，裝在里边，兩人抬上，回到石臼村。又將受傷的崔學考橫馱驢背，酒來山等四人也被解押回城。

起身的時候，已是傍晚，趕走到南河，已經天明。這時招引了很多人來看，王崔古身坐框中，英風滿面。聽說要進東門，他就高聲大喊說，進東門就進東門，唔呀呀呀！其餘被俘的人，皆迈着昂揚的步子，毫不示弱。進到城里，齊集行台，后又解往南河。王崔古以凌遲死，酒來山和老王以切頭死。崔學考被釘在南城門外的東墻上，延至次日，仍朗朗講話：不是“破陣”，就是“上房”，叫號數日，力盡而亡。吳小全、王有呆二人，又從南河解回，發押縣府，后又解府復審，最後也壯烈犧牲了。

此外，還有張壬午、崔玉春、吳冬旦和尚狗鎖四人，也被率速逮捕，終于處死。總計，這一案件的始末，石臼村斃命的共十三人。

## 帝国主义办理山西“教案”的詭詐罪行

乔志强

1900年8月，帝国主义侵略軍攻占北京以后，清朝政府公开下令镇压义和团，向侵略者求降。义和团的英勇斗争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，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，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，这个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，在中外反动势力勾结镇压下遭到了失败。清政府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，不惜更多地出卖国家权利。1901年9月，签订了“辛丑和约”。这个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一次巨大的詭詐，使中国完全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。在这个条约中，帝国主义除了取得驻兵使館区、驻兵控制北京到海口的交通，由清政府遣使“謝罪”等等不法权利之外，单只“賠款”一項即达四亿五千万两白銀，分三十九年付清，加“利息”共达982,238,150两之多。仅山西省从1902年起，每年即分担这项“賠款”1,163,000两。除过“辛丑条约”而外，帝国主义还通过“傳教士”在各省借口“議結教案”，和地方政府訂立什么“議結教案合同”，又进行了一次詭詐。现在将山西部分，簡述如下。

1900年9月29日(庚子年閏八月初六)，錫良接任山西巡撫后，即乘清政府求降政策的意旨，在全省范围内“保护教士，安輯教民，痛懲拳匪”(錫良語)，先后借給还留在山西的英、法、意等

國傳教士銀子共 39,500 兩，積極準備辦理所謂“教案”。1901 年 1 月 19 日（庚子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），並在冀寧道設立“教案局”，專管其事，後改為“洋務局”。1901 年 4 月 9 日，投機媚外的官僚岑春煊繼任山西巡撫，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把沈敦和調到山西洋務局任總辦。沈敦和，浙江鄞縣人，留學英國，擔任過翻譯等職。八國侵略軍佔領張家口後，沈敦和即擔任張家口洋務局總辦，辦理教案，制定辦法十條（見《皇朝經世文新編續集》卷十九），以投降媚外出名。4 月 16 日來到太原，即協助岑春煊制訂公布了“清理山西教案章程”十八條，成為他們幫助帝國主義分子進行詭詐的依據。岑春煊又“借給”傳教士白銀十三萬兩，作為“賑濟”之用。4 月 23 日，八國聯軍侵犯娘子關，沈敦和被派前往，與法國侵略軍首領巴堯訂立了“設卡保商章程”其中規定山西巡撫必須“認真奉行”“教案善後章程”十八條（見程裕編：《增訂教案匯編》卷一）。岑春煊又於歸化城、潞安府設洋務分局，積極派人找回在義和團運動時逃走的傳教士，來辦理教案。

這時帝國主義侵略分子也在積極進行詭詐活動。天主教方面，由漢口法國領事瑪璽理通過岑春冀（岑春煊之弟，時任湖北漢黃德道）要以五百萬兩銀子包辦山西教案。後減至二百五十萬兩。意國公使看着眼紅，也要爭着包辦。耶穌教方面，由公理會代表文阿德、自立會代表叶守真與英國侵略分子李提摩太擬出一個“辦理山西教案章程”七條，交給李鴻章，提出詭詐方案。他們得知岑春煊辦理教案的消息以後，在北京的英美傳教士推派代表八人，包括文阿德、叶守真、敦崇禮，於 6 月 22 日啟程來山西，沿途飛揚跋扈，迫使清政府招待。有記載說：“沿途各官員預備館舍務極華美，一切供應必使豐腴。守土各官迎接禮儀，如

接上賓。自京至晉各驛，供應車馬肩輿，凡所止宿處，皆須結彩張樂。“及至晉垣，岑中丞率闔城文武出郭迎迓，儀等接欵差。入誠駐皇華館，待以上賓禮”（見《潛園瑣記》卷六）。7月9日到太原，與洋務局談判。1901年8月，由洋務局與自立會訂“議結教案合同”六條，以及“山西壽陽縣耶穌教自立會議結教案合同”六條，與內地會也訂立了同樣合同九條。10月，又與自立會續訂合同十八條，陸續與公理會、浸禮會，都分別簽訂了詭詐性的合同。天主教方面則由岑春煊派候補道鄭景福到北京，與法國、意國公使談判。在1901年10月12、21日，分別訂立了“山西教案合同”各十八條。合同訂立以後，法國公使忽然又嫌“賠款不敷賠償”，無理要求翻案。幾經談判，1902年才又由鄭景福、沈敦和與法使呂班另立“善後合同”，增加賠款了事。這是帝國主義分子進行詭詐的主要過程。

在這些詭詐性的文件當中，帝國主義分子又勒索了一批所謂“議結教案”的“地方賠款”，數字如下：

意國公使所管太原及省北天主教，勒索100萬兩，交付期限四年，內有法國女修士會十萬兩，全部100萬兩。後因侵略者急于權取，乃貼息七萬兩，於一年內索走（見山西洋務局與意國公使訂立“山西教案合同”；貼息經過，見光緒28年5月12日奎順等奏折，原件現存中央檔案館）。

法國公使所管省南、口外天主教，勒索140萬兩。原定75萬兩，訂合同後，法公使又無理增索65萬兩（數字見山西洋務局與法使訂立“山西教案合同”及光緒28年11月28日趙爾丰奏折，兩者少有差異，今依趙折。法公使翻案增索事，見趙折，該折現存中央檔案館）。



耶穌教各教會，勒索 233,725 兩有零，當時交清。其中內地會 65,256 兩有零，公理會 25,833 兩，自立會借 1100 兩，未還。（見“山西內地會總牧師榮冕熙，洋務局續議教案合同”第八條；“山西洋務局議結教案譯文”；“山西耶穌教自立會總教士葉守真與洋務局議結教案合同”，其它各會數字待查。耶穌教合計數見趙爾丰奏折。

以上共計 2,633,725 兩有零。這個數字還沒有包括以下幾項：（一）全省各級地方政府“借給”教士的銀糧，僅天主教方面即約有三、四十萬兩。這些“借款”在訂立合同後，有些扣除，有些就只借未還（見山西洋務局與意公使訂立的“山西教案合同”及其它“教案合同”）。（二）修復各地教堂所用之款，如太原北門街 1902 年開修，1905 年竣工之教堂，山西巡撫即撥款二萬兩（見《鳳主教晉鐸金慶紀念》42 頁）。（三）于陽曲縣等八處為教士修坟墓，岑春煊又于每處坟墓旁撥銀二百兩購買田地，雇工耕種看守（見“山西內地會總牧師榮冕熙，洋務局續議教案合同”第二條）。并于各地立碑。（四）李提摩太提出“辦學堂”之“罰款”五十萬兩。（五）洋務局與侵略者談判之費用川資。據當地人記載，為數頗大。如太谷縣接待談判之教士，“館驛之中，陳設極其華美，供饌極其丰盛，一日之費足抵中人數家之產。祇求得夷人之歡心，而不顧百姓之疾苦”（見《退想齋日記》，光緒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）。把這些數目如果合計起來，侵略者勒索的數字更大。

一些教派的侵略分子，一方面虛偽地宣稱“免賠”或“減賠”，要求“撫台出一告示”，為他們宣揚，企圖欺騙群眾。同時卻又惡毒地要求什麼“罰款”，用以進行文化侵略。在李提摩太提出的“教案章程”中，即提出無理要求，“共罰全省銀五十萬兩，每年交